

# 桑悅及其《楚辭評》考論\*

陳煒舜\*\*

臺灣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文學系

## 摘要

明代前期，皇權膨脹，道學獨尊，文壇由臺閣作家主導，楚辭學甚為不振。師古說先驅者桑悅的《楚辭評》是明代最早的楚辭學專著。此書從未付梓，久已亡佚，其遺說只有二十五條保留於蔣之翹編《七十二家評楚辭》。本文通過桑悅生平及著作的考辨、其文學思想大要的綜論，探討《楚辭評》之流傳、真偽、成書年代問題；並本於《七十二家評楚辭》所錄桑悅二十五條遺說，考述《楚辭評》原書之內容，進一步了解桑悅的文學思想，以見成化、弘治間楚辭學、文學思潮的特色及學風轉變的實況。

**關鍵詞：**桑悅，《楚辭評》，《七十二家評楚辭》，楚辭，明代文學

## 一、引言

明太祖建國後，元末戰亂頻仍的局面雖然結束了，但學術風氣卻隨著皇權膨脹、道學獨尊而沉寂。永樂以後，啾緩春容的臺閣文風大行其道。正如陳書錄所言，從明初到永樂以後一段時間的正宗文壇上，出現了文學思想由多元化轉向單一化、文學的儒雅品位由上升轉為沉降的演變軌跡。<sup>(註1)</sup>臺閣文學是皇權影響下，程朱道學在詞章之學上的體現。由於儒家認為屈子行徑有失中庸，《楚辭》文章華

\* 本文資料檢核，得滬上楊月英女士相助；兩位匿名評審委員的寶貴意見，啓我良多，謹致謝忱。

\*\* 本文作者電子郵件信箱：kolyushka@yahoo.com。

1. 陳書錄，《明代詩文的演變》（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年初版），頁114。

而少實，臺閣諸臣皆罕言屈騷；一般學者讀《騷》論《騷》，也大率本於朱子《楚辭集註》。朱子嘗批評屈子道：

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註2)

永樂後以楊士奇爲首的臺閣諸臣，有關屈騷的論述大都不離此宗。成化時，何喬新重刊朱註作序，認爲《楚辭》導致後世文人捨質逐華，只有經朱子刪註，《楚辭》方才大義昭然，讀者可以放心閱讀了。(註3)閣臣吳寬亦云：「朱子之註《離騷》，可謂無遺憾矣。」(註4)在這樣的主流意見影響下，明代前期的大多數學者即使對《楚辭》略有論述，也只停留在闡發朱註的層面，未能深入。故易重廉《中國楚辭學史》指出，明代前期的楚辭學顯得比較沉寂，明代楚辭學繼武宋代而無可慚恧的那要到它的後期。(註5)

就楚辭學專著而言，洪武至正德這一百四十年間，廣爲流行的只有朱子《楚辭集註》。正德十三年(1518)，黃省曾重刊王逸《楚辭章句》，這種局面才被打破。至於新的論著方面，著錄於書目者僅有宣德、正統間吳訥的《文章辨體》。不過，此書分文體爲五十九類，楚辭僅統屬於「古賦類」；所論雖有獨到之處，卻遠遠稱不上楚辭學專著。姜亮夫《楚辭書目五種》所載明代楚辭學專著，最早的有周用《楚詞註略》及馮惟訥《楚辭旁註》。周書成於嘉靖二十七年(1548)以前；崔富章《楚辭書目五種續編》謂馮書初刻於正德十六年(1521)。而天啓之時，蔣之翘刊《七十二家評楚辭》，在〈自序〉中提及兩種從來不見於世的楚辭學著作：

2. [宋]朱子，《楚辭集註》(臺北：文津出版社，1987年版)，頁2。

3. [明]何喬新〈楚辭序〉：「孔子之刪《詩》，朱子之定《騷》，其意一也。詩之爲言，可以感發善心，懲創逸志，其有裨於風化也大矣。《騷》之爲辭，皆出於忠愛之誠心，而所謂『善不由外來、名不可以虛作』者，又皆聖賢之格言。使放臣屏子，呻吟詠嘆於寂寞之濱，則所以自處者，必有其道矣。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寧不淒然興感，而迫其倫紀之常哉！此聖賢刪定之大意也。讀此書者因其辭以求其義，得其義而反諸身焉，庶幾乎朱子之意也，而不流於雕蟲篆刻之末也。」(見《椒邱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年初版)，頁138至139。)

4. [明]吳寬，〈題九歌圖後〉，《家藏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年初版)，頁462至463。

5. 易重廉，《中國楚辭學史》(長沙：湖南出版社，1991年初版)，頁367。按：易氏將明代分爲前後兩期，從開國到世宗嘉靖二百來年是前期，萬曆以後七十來年是後期。本文則將明代分爲前後兩期：洪武至弘治(1368-1505)爲前期，正德至崇禎(1506-1644)爲後期。

參古今名家評，暨家傳李長吉、桑民懌未刻本，裁以臆說，謀諸剗厠氏。

(註6)

李長吉乃唐人李賀，而桑民懌即成化、弘治間的桑悅。相比之下，桑悅於弘治十六年（1503）去世，則其未刻本的成書年代必早於馮、周二書。據筆者檢核所得，桑悅此書實乃可考最早的明人楚辭學專著，也是明代正德以前唯一的楚辭學新著。其確切名稱已難考知，為便行文，姑名之為《楚辭評》（說見本文第五節）。今據北京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天啓六年（1626）忠雅堂刊《七十二家評楚辭》，共得桑悅評論二十五條，（註7）此即《楚辭評》遺說之可考者。

桑悅《楚辭評》自明末以來，並無書目著錄。其書今亦不見，殆已亡佚。然而，作為可考最早的明代楚辭學專著，《楚辭評》有其不容抹殺的價值。永樂以後的百年間，在時局變易、學風移轉、地域文化、個人經歷等各種因素的影響下，臺閣文風逐漸受到挑戰。這些異議者以吳中文士為主，他們視七子有筆路藍縷之功。桑悅原籍常熟，名列吳中文士之林。袁震宇、劉明今《明代文學批評史》即將桑氏定位為師古說的先驅者。（註8）桑悅自恃才高，卻長期沉淪下僚，抑鬱不得志，故其文學思想與臺閣文風尤相逕庭。有關屈騷的論述構成了桑悅文學思想的重要部分。就楚辭學本身來說，《楚辭評》的面世顯示當時的學者對《楚辭》的研究不再局限於義理的闡發，而更傾向於詞章的鑑賞及內容的考訂。就文學、乃至學術的發展演變來說，《楚辭評》恣肆的風格更展露了成化、弘治間臺閣文風衰熄、道學僵化的實況。因此，對這部佚書的作者與內容作一全面性的考述是必要的。

## 二、桑悅的生平及著作

### （一）生平考略

桑悅（1447-1503），字民懌，號思玄居士，別號鶴溪道人，太倉人，祖籍常

6. [明] 蔣之翘，《七十二家評楚辭·自序》（北京：中國科學院藏忠雅堂天啓六年（1626）刊本）。

7. 按：《七十二家評楚辭》一書，筆者已檢核者有北京中國科學院藏本（簡稱中科院本）、上海圖書館藏善本（簡稱上圖甲本）、上海圖書館藏普通本（簡稱上圖乙本）。取三本比勘之，各得桑評二十五條，文字差異甚微。現據中科院本，於附表二詳列其內容。

8. 見袁震宇、劉明今，《明代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初版），頁137至138。

熟。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謂其敢爲大言，銓次古人，以孟軻自況。爲諸生時謁部使者，書刺曰「江南才子」，使者大駭，延之校書，預刊落以試。悅校至不屬，即索筆請書足，使者乃禮敬焉。<sup>(註9)</sup>年十九，領成化元年（1465）鄉薦，成舉人。其後三次參加會試，皆不第。廖道南《殿閣詞林記》謂桑悅會試時，作〈學以至乎聖人之道論〉，有「我去而夫子來」等語，爲大學士丘濬所黜。又因策有「胸中有長劍，一日幾回磨」等語，爲簡討吳希賢所黜。<sup>(註10)</sup>成化八年（1472）得乙榜，年二十六，籍誤以二爲六，以新例不許再試。桑悅自往申辯，考官因忌其狂，不予改正。遂按例選授江西泰和訓導，得門生徐威等人。十五年（1479），〈兩都賦〉成，晉呈御覽。<sup>(註11)</sup>十六年（1480），受楚藩聘典試。十九年（1483），至西昌司，知雲南貢舉。<sup>(註12)</sup>弘治三年（1490），升長沙通判，專以催科爲任，無績。弘治六年（1493），調柳州通判。<sup>(註13)</sup>弘治十年（1497），以父喪歸，遂不出。褐衣楚製，往來郡邑間。<sup>(註14)</sup>十三年（1500），與太倉知州李端合修《太倉州志》。十六年（1503）卒於家，年五十七。<sup>(註15)</sup>

丘濬雖黜桑悅，然亦重其才。據王世貞《藝苑卮言》所記：

時丘濬爲尚書，慕悅名，召令具賓主。已出己文令觀，給曰某先輩誤。

悅心知之，曰：「公謂悅爲逐穢也耶？柰何得若文而令悅觀？」濬曰：

「生試更爲之。」歸誤以奏，濬稱善。已令進他文，濬未嘗不稱善也。悅

名在乙榜，請謝不爲官，俟後試，而時竟以悅狂，抑弗許。調邑博士。

9. [清]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初版），頁284。

10. [明] 廖道南，《殿閣詞林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年初版），頁318。

11. 按：桑悅〈兩都賦〉所附上奏，題「成化十有五年二月一日江西吉安府泰和縣儒學訓導臣桑悅百拜書於乾坤一寄樓中」。（見《思玄集》（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影印萬曆二年（1674）桑大協活字刊本，1997年初版），頁117。）

12. 按：[明] 桑悅，〈吊賈太傅文序〉：「成化庚子，楚藩聘予典文衡……又三年，知滇南貢舉。」（同註11，頁34。）庚子即成化十六年。

13. 按：[明] 桑悅，〈庸言引〉：「由西昌司□擢倅長沙，專以催科爲職業。」（同註11，頁26。）〈鶴溪府君泣血誌〉：「……秩滿，始擢長沙通判。不三載，又調柳州。」（同註11，頁81。）〈和朱文公詩序〉：「今年春，決於告歸，既而果以罷，□調柳。」（同註11，頁138。）〈和朱文公詩序〉題於「弘治癸丑三月望」，即弘治六年，桑悅調柳即在此年。由此上推三載至弘治三年，即其始任長沙通判之年。

14. 同註9，頁285。

15. 按：《明史》謂桑悅「父喪歸，遂不出」。考桑悅〈鶴溪府君泣血誌〉謂其父桑琳「卒於弘治丁巳五月廿有六日」，丁巳即弘治十年，桑悅自辭官柳州，當在此年。（同註11，頁81。）乾隆《柳州府志》之〈秩官〉謂桑悅於正德間任通判，誤。見[清] 王錦修、吳光昇纂，《柳州府志》（海口：海南出版社影印乾隆二十五年（1750）刊本，2000年初版），頁153。

悅為博士踰歲，而按察視學者別丘濬。濬曰：「吾故人桑悅，幸無以屬吏視也。」<sup>(註16)</sup>

桑悅竟當面斥丘濬之文為「穢」，頗有孟子「說大人則藐之」的風度。而丘濬不以為忤，依然獎掖有加。其後，大學士李東陽對於桑悅的坎壈失志也甚為憐惜，嘗贈詩云：

十年三度試春闈，親見聲華滿帝畿。甲第久慚唐李郢，奇才終誤宋劉幾。  
功名歲晚非蓬鬢，湖海官貧尚布衣。試看孤鷹下林落，壯心還向碧天飛。

(註17)

桑悅終生潦倒，早年奔忙於科舉考試，其詩道：

連年遠行役，心死精力疲。……欲求升斗祿，活此老少飢。苦無辟穀術，  
可免塵網羈。<sup>(註18)</sup>

可謂真實生活的寫照。錢謙益謂桑悅晚年居家益任誕，又曰：

吳郡閻起山秀卿，作《二科志》，以民懌首列狂簡，曰：「狂者未嘗無人，  
至如民懌，可與進取者也。」余少嘗著論，以秀卿為深知民懌云。<sup>(註19)</sup>

比觀李東陽詩所云「壯心還向碧天飛」，可知桑悅暮年時進取之心猶在，與祝允明、唐寅等科舉不售而率性放浪的行徑不同。這與他學本孔孟、推崇儒家的思想態度有很大的關係。

## (二)著作考略

楊循吉為桑悅作墓誌銘，曾提及桑悅生前著述的情況：

- 
16. [明]王世貞，《藝苑卮言》，載《弇州四部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年初版）卷一四九，頁5a至5b。
  17. [明]李東陽，〈送桑民懌訓導〉，《懷麓堂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年初版）卷十二，頁16b。
  18. [明]桑悅，〈會試感懷〉，同註11，頁127。
  19. 同註9，頁285。

凡為集十卷。既而力探群經，求聖人之道，自《易》、《春秋》、《周禮》，皆有義釋，又數十卷，合二家總二十餘萬言。(註20)

楊氏謂「又數十卷，合二家總二十餘萬言」所指何書，語焉未詳。然可知桑悅於文集以外，尚有《周易義釋》、《春秋義釋》、《周禮義釋》三書。(註21)計宗道〈思玄集序〉則云：

凡所著作甚富。晚年厭其浮於理者，刪去不少。如《易》《春秋》《周禮》與夫子史，多所發明成卷。惜乎伯道無兒，身後散逸無幾，此尤不幸也。

(註22)

綜合兩家之說，可知桑悅生前之著述甚多，於經、史、子部之書多所發明。然因其子桑阜早卒，致使遺著乏人保存整理，頗有散亡。

楊循吉謂桑悅生前便有文集十卷。去世後，計宗道整理遺稿，訂為十六卷，額曰《思玄集》。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云：

民懌在燕市，見高麗使者市本朝兩都賦無有，心竊恥之，作〈兩都賦〉。慕阮公〈詠懷〉，作〈感懷〉五十四首。居長沙，著《庸言》，自以為窮究天人之際，非儒者所知也。(註23)

〈兩都賦〉、〈感懷〉五十四首、《庸言》悉收入《思玄集》十六卷本。十六卷本由計宗道初刊於弘治十八年(1505)。萬曆二年(1574)，桑大協以活字重刊此本，有李祝協後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即據此本影印。其後尚有萬曆四十四年(1616)翁憲祥刻本、雍正四年(1716)謝浦泰鈔本。諸本或題作「桑悅著，徐威註」。參《列朝詩集小傳》：「成化中，桑民懌分教泰和，廣威〔文〕受業門下，取其古賦字棘喙不能句者，為之疏通箋註。」(註24)可知其概。《庸言》全書一卷，

20. [明] 楊循吉，〈明故思玄先生柳州府通判桑公墓誌銘〉，同註11，頁2。

21. 按：《周禮義釋》遺說，清初朱彝尊《經義考》錄有四條。

22. [明] 計宗道，〈思玄集序〉，同註11，頁1。

23. 同註9，頁285。按：桑悅〈兩都賦〉所附上奏題於成化十五年(1479)，又謂：「成化乙酉，鄉薦屬舉進士之京，每見安南、朝鮮進貢陪臣尋買本朝兩都賦，市無以應……去年春……訓課之暇，頗有長晷，因憶舊聞，衍成二篇。」(同註11，頁117。)則〈兩都賦〉實作於成化十四年(1480)，距成化元年乙酉(1465)春闈已十五年。知桑悅〈兩都賦〉作於泰和，而非北京。錢謙益誤記。

24. 同註9，頁285。

後世或題爲《桑子庸言》、《思玄庸言》。除《思玄集》本外，又有《百陵學山》本、《學海類編》本，《叢書集成初編》、《百部叢書集成》、《續百子全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皆收錄；然內容視《思玄集》本有所刪削，並非足本。

《太倉州志》十一卷，《明史·藝文志》有著錄。<sup>(註 25)</sup>此書乃桑悅與太倉知州李端於弘治十三年合修，後於宣統元年（1909）重印。北京圖書館編《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續編》收有宣統版之影印本。書中多有桑悅按語。

復次，臺北成文出版社所編《中國方略叢書》收有《金文靖公北征錄》，出版頁題爲桑悅著。桑悅序曰：「金文靖公……作《北征前後錄》，舒城秦公（按：即秦民悅）既有自爲之序，以引其端，復命予伸之以言。」<sup>(註 26)</sup>可知《北征錄》實際上乃永樂時名臣金幼孜所著，桑悅只是作序者而已。

至於本文所討論《楚辭評》的內容，最早見錄於蔣之翹《七十二家評楚辭》，稍後沈雲翔《八十四家評楚辭》、周拱辰《離騷草木史》亦有遙錄。桑悅生前是否刊印過自己的著作，現已難知其詳。觀計宗道之序作於弘治十八年，距離桑悅去世僅僅兩年，卻已嘆息其著作「散逸無幾」，蓋皆未付梓之故。《楚辭評》未刻本爲蔣家所得，珍藏數世，可謂幸甚。

### 三、桑悅文學思想概述

晚明以後，學者對於桑悅的爲人和作品有不少非議。如胡應麟云：「民懌高自矜詡，其詩體格卑弱，可謂大而無當。」<sup>(註 27)</sup>四庫館臣曰：「所作〈兩都賦〉，有名於時。然去班固、張衡，實不可道里計。」<sup>(註 28)</sup>胡應麟爲後七子羽翼，批評桑悅時不免帶有門戶之見。清人治學，力矯明人浮淺，故卑視桑悅，亦屬自然。而近人陳田《明詩紀事》之論則較爲持平：

25. [清] 張廷玉主編，《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版），頁 2407。

26. [明] 桑悅，〈北征錄序〉，[明] 金幼孜，《金文靖公北征錄》（臺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本，1968 年初版），頁 2。

27. [明] 胡應麟，《詩藪·續編》（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影印明刻本，1997 年初版），頁 418-61。朱彝尊《明詩綜》亦引此說，見 [清] 朱彝尊，《明詩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 年初版）卷二十四，頁 1a。

28. [清] 永瑤主編，《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影印初版），頁 1560。

第其所作利鈍雜陳，妄自矜詡，宜為前人詆訶。(註 29)

成化、弘治間，正是臺閣文風衰退、七子師古說興起的時代。桑悅仕途多舛，故論文更異於主流。作為師古說的先驅，桑悅不遺餘力地批評文尚歐曾、詩宗王孟的臺閣文風，並創作奇崛古奧之文以圖矯正。然桑悅居師古風氣之初，創作仍帶有嘗試性質，何況創作水平與鑑賞能力之間本來就不一定有必然關聯，故其作品不免「利鈍雜陳」。加上桑悅矜誕簡傲的個性、好為大言的風格，受到後人的詆訶在所難免。不過，與桑悅同時之人皆重其文而不以人廢言，可見他提倡的師古說在當時得到廣泛支持，支持者甚至包括丘濬、李東陽等臺閣中人。故此，本節試由《思玄集》及《庸言》探究桑悅的論文之語，先分三目論述其文學思想，再專目評析其楚辭論的特色。

### (一)文的起源與功用

李祝協稱桑悅「以孟軻自況，原、遷以下弗論也」，(註 30)似能反映其文學好尚，其實不盡然。計宗道引桑氏之語曰：

屬辭須宗屈宋班馬〔馬〕，造□宜祖周程張朱。(註 31)

可見桑悅將義理與詞章之學分得很清楚。所謂「祖周程張朱」，與「以孟軻自況」一樣，是表明自己歸本於儒學的立場。與明初宋濂一樣，桑悅認為文、道二者是合一的：

文者道之英。古人體道於身，而宣之於文，非徒文也。然所謂文者，自動作、威儀，以至發之於功名、事業，皆是也。曰詞章也者，特文之一事耳。是故見其人不見其文，可也。見其文不見其人，不可也。如孔子之六經，孟子之七篇，皆世不我用，暮景適成。故遊孔子之門者，不求

29. 陳田，《明詩紀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初版），頁997。

30. [明] 李祝協，〈思玄集後序〉，同註11，頁192。

31. [明] 計宗道，〈思玄集序〉，同註11，頁1。按：原書此處有破損，造字後一字無從辨認。



孔子於六經。遊孟子之門者，不求孟子於七篇。(註 32)

他提出：除詞章以外，動作、威儀、功名、事業，都是「體道於身」而產生的英華，皆可納入「文」的範疇。孔子晚年定六經、孟子晚年著七篇，只是將所體之道以詞章的形式呈現出來而已。

不過，桑悅以為詞章縱非體察聖道最直接的途徑，其功用也非常大：

吾詩根於太極，天以高之，地以下之，山以峙之，水以流之，庶物以飛潛動植之，日月宣其明，雷霆發其震，雨露播其潤澤，散之則元氣流行，收之於心，發之於言，被之管絃，則可以感天地、動鬼神，詩之功用大矣哉！乾坤毀，日月息，詩迺收聲，復歸太極，功用始隱。後世詩莫盛於唐，若李、杜大家，脈傷月露，搜盡珠璣，果知是理否耶？故曰：刪後無詩。(註 33)

詞章既然是道之英，根於太極，自然可以「感天地、動鬼神」。對於《三百篇》以後的詩，桑悅似乎都不滿意；連李白、杜甫，他也認為只是「脈傷月露、搜盡珠璣」，耽於遣詞造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對於詩的功用並沒有確切的認知。這種「刪後無詩」的觀點，正可謂前後七子的前鋒；然而不同的是，桑悅的觀點主要源自對儒家的推崇，而七子的尚古則大率是著眼於詞章的古雅了。

## (二)反對臺閣體

桑悅關於詩之功用的議論，朱彝尊批評其「大而夸狂，幾於悖矣」。(註 34)桑悅「刪後無詩」之說，主要是針對當時江河日下的臺閣文風而發。《列朝詩集小傳》記載，有人以當世翰林文章問桑悅，答曰：「虛無人，舉天下惟悅，其次祝允明，

32. [明] 桑悅，〈傲庵稿序〉，同註 11，頁 50。按：宋濂〈朱葵山文集序〉可資比對：「文不貴能言，而貴於不能不言。日月之昭然，星辰之燁然，非故為是明也，不能不明也。江河之流，草木之茂，非欲其流且茂也，不能不流且茂也。此天地之至文，所以不可及也。為聖賢亦然，三代之《書》、《詩》，四聖人之《易》、孔子之《春秋》，易求其為文哉？道充於中，事觸於外，而形乎言，不能不成文爾。故四經之文，垂百世而無謬，天下則而準之。」見《文憲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 年初版），頁 363。

33. [明] 桑悅，《庸言》，載《思玄集》卷二，頁 27。

34. [清] 朱彝尊，《明詩綜》卷二十四，頁 1b。

其次羅玘。」<sup>(註 35)</sup>袁震宇、劉明今解讀桑悅這番話道：桑悅認為當時的「翰林文章」，即臺閣體，不足一道，只有他自己與祝允明、羅玘的奇古文才值得稱揚。話雖說得太狂妄，但當時「學士丘濬重其文」，「鄉人莫不重其文」，可見尚古的風氣已漸漸地形成了。<sup>(註 36)</sup>

舉例來說，桑悅對明初高棅的《唐詩品彙》的批評，就能體現他對臺閣文風的不滿：

唐人好吟詠，傳凡三百餘家，真有盛中晚之殊，唐業隨之可考也。楊仲弘等所選俱得其柔熟之一體，唐人詩技要不止此。國朝閩人高廷禮有《唐詩品彙》五千餘首……要亦仲弘之見。是詩盛行，學者終身鑽研，吐語相協，不過得唐人之一支耳。欲為全唐者當於三百家全集觀之。<sup>(註 37)</sup>

《唐詩品彙》以初、盛、中、晚來替唐詩分期，分編定目則有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變、餘響、旁流之殊。由於此書與元代楊士弘《唐音》一樣，得唐詩中「柔熟」一體，合乎臺閣文章的情調，故終明一代臺閣宗之。不過，桑悅卻相信文章與時高下，不同時代的文學作品有不同的風貌。唐詩既有初盛中晚之分，要洞察唐人風貌，唯有遍讀三百家集。若讀楊士弘、高棅之書，僅嚐一嚙，難知唐人全味。在這裡，桑悅明顯對臺閣體提出了異議。<sup>(註 38)</sup>

35. 同註 9，頁 284。

36. 同註 8，頁 137。

37. [明] 桑悅，〈唐詩品彙後序〉，載 [明] 黃宗義，《明文海》（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 年初版）卷二一二，頁 25b 至 26a。

38. 按：有關桑悅對高棅《唐詩品彙》「柔熟」的批評，陳國球有如此的見解：「（《唐詩品彙》）其流通不廣，同時期的文人著述，亦罕有提及。據現存資料，只知稍後的常熟人桑悅是閩人以外最早提到《唐詩品彙》的，他的〈跋唐詩品彙〉（按：即〈唐詩品彙後序〉）不知寫於何時，亦無交代在那種情況下接觸到《唐詩品彙》，然而從他的語氣就知道他既未詳讀《品彙》，他的識見也和元末明初以來一般人對《唐音》的看法一樣，並未能把握《唐音》的文學史意識，以及《品彙》在這方面的發展。」（見陳國球，〈唐詩的傳承：明代復古詩論研究〉，臺北：學生書局，1990 年初版，頁 237。）此說值得商榷。桑悅接觸《唐詩品彙》的年代，並非全然無考。據陳國球所言，《唐詩品彙》第一次板刻乃是成化間江西按察使陳煒所為。彭韶謂陳煒於成化庚寅（六年，1470）任江西按察司副使，後陞江西布政司右布政使，成化甲辰（二十一年，1485）卒於官。（見 [明] 彭韶，〈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耿菴陳公煒墓誌銘〉，載 [明] 焦竑，《國朝獻徵錄》（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據明刊本影印，1997 年初版），頁 104-526。）則其刊印《唐詩品彙》之年代必在此十五年間。據筆者前文考證，桑悅於成化八年（1472）至弘治三年（1490）間一直在江西泰和縣擔任訓導，正與陳煒江西按察使、右布政使任期重合。自成化八年至二十一年，二人共事一省計十三年。王世貞《藝苑卮言》記載：「悅名在乙榜，請謝不為官，俟後試，而時竟以悅狂，抑弗許。調邑博士。悅為博士踰歲，而按察視學者別丘濬。濬曰：『吾故人桑悅，幸無以屬吏視也。』按察既行，部抵邑不見悅，顧問長吏：『悅今安在？豈有恙乎？』長吏素恨悅，皆曰：『無恙，自負不

### (三)詩以運意爲宗

桑悅雖然主張師古，但其師古說的內容遠沒有七子「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那樣拘泥。因爲他好爲偏激之大言，故其「刪後無詩」之論，除了從詩之功用的角度來分析外，我們不宜作過度的解讀。正如前賢所言，兩漢賦家皆通小學。以「棘喙」的〈兩都賦〉觀之，桑悅對於小學自亦有所究心。加上他說「屬辭須宗屈宋班馬」，可知其主張文學創作從辭賦入手。進而言之，桑悅非常強調作品的「運意」，這從其〈唐詩分類精選後序〉中可以得知：

古人之詩，運意而已。辭略點綴而意自明，往往餘意出於句字之外……  
 〈離騷〉之作，比興略備，真有《三百篇》遺意。蓋原之詞本爲憂國畏讒、鬱抑不平而作，又安得不馳驚於變風雅之末流哉？如〈九歌〉「心不同兮媒勞，交〔恩〕不甚兮輕絕」最爲善語。而使原當文武之世，茲言何爲而發？就使文武之世之詩人當原之世，「吁嗟騶虞」、「人之好我，示我周行」等語，又豈可鑿空而妄出哉？風雅變中之變，又不可專委之人也。降至魏晉，亂日多而治日少，則能詩如曹子建、阮嗣宗、張茂先、陶淵明輩將何所飲以發和平之音耶？大抵《三百篇》以後，取其詩之上薄風雅，當味其意之深淺何如，不可專論其辭之平不平也。（註39）

從這段文字中，我們可以歸結三點：

肯迎耳。』乃使吏往召之，悅曰：『連宵旦雨淫，傳舍圯，守妻子亡暇，何候若？』按察久不待，更兩吏促之。悅益怒曰：『若真無耳者。即按察力能屈博士，可屈桑先生乎？爲若期三日，先生來。不三日，不來矣。』按察欲遂收悅，緣濬不果。三日，悅詣按察，長揖立不跪。按察厲聲曰：『博士分不當得跪耶？』悅前曰：『漢汲長孺長揖大將軍，明公貴豈踰大將軍，而長孺固亡賢於悅，奈何？以面皮相，恐寥廓天下士哉！悅今去，天下自謂明公不容悅，曷解耳？』因脫帽徑出，按察度亡已，乃下留之。」（同註16，卷一四九，頁4b至5b。）桑悅成化八年赴江西時，陳煒正在江西按察使任上，故《藝苑卮言》所記按察使，乃陳煒無疑。桑悅作爲陳煒的下屬，絲毫不屈於其盛氣；然閱讀到陳煒刊印的《唐詩品彙》，並作後序，極有可能。抑有進者，《唐詩品彙》終明一代，臺閣宗之。臺閣諸臣雖終究不了解此書獨到的文學史意識，卻以此書爲宗，推其原因，無疑是此書對於「柔熟」的標舉與啾緩春容的臺閣文風相契合。從接受論的角度來看，臺閣諸臣對於《唐詩品彙》的理解，也就在於「柔熟」二字。誠如陳國球所言，這種獨到的文學史意識同樣也沒有被桑悅所理解。但桑悅對於此書的批評，主要是站在臺閣諸臣的對立面而發的。因此討論桑悅的文學思想，我們不應只看他不理解《唐詩品彙》的一面，也應注意他力圖改變臺閣文風獨大之勢的另一面。以是觀之，陳國球僅據桑悅之語氣來判定其未有詳讀《品彙》，似嫌武斷。

39.〔明〕桑悅，〈唐詩分類精選後序〉，同註11，頁46。

- 一、桑悅雖喜愛華麗的詞藻，但卻將之繫於「意」之下。換言之，詞藻只是「意」的輔佐。(所謂「辭略點綴而意自明」，正可和《庸言》對李杜「脈傷月露、搜盡珠璣」的批評對看。)
- 二、世運關乎文章。文武之時有〈騶虞〉、〈鹿鳴〉等盛世之音，懷襄之際有〈離騷〉〈九歌〉等衰世之音。無論《三百篇》還是《楚辭》，都能反映世道，並非「鑿空而妄出」。因此，《楚辭》雖為《三百篇》之苗裔，居變風變雅之末流，其聲價卻依然光耀乾坤。
- 三、屈子、曹植、阮籍、張華、陶潛等詩人，身處亂世，作品自然有不平之氣。若身處亂世而故為和平之音，無疑是矯柔作態。因此，「味意之深淺」才是論詩者之首要。

正統以後，朝政日壞。而臺閣作家仍繼續作其春容演迤的頌聖之語，這不僅不侔於世況，且顯得非常虛偽。袁震宇、劉明今指出：「當時臺閣作家一味倡導雍容和平之聲，桑悅此論唱的正是反調。」<sup>(註40)</sup>可見桑悅強調「運意」，強調「味意之深淺」而不「專論其辭平不平」，也是針對臺閣文風而發。

#### 四從《思玄集》看桑悅的楚辭論

朱子對於屈原、《楚辭》的態度是有褒有貶的。其〈楚辭集註目錄序〉云：

竊嘗論之：原之為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為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為書，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為訓，然皆生於縈絀惻怛、不能自己之至意。<sup>(註41)</sup>

朱學獨尊後，明代統治階層為了操控思想，對於屈子的評價遂傾向於貶斥的一面。這種評價在明代前期的學者間十分常見。縱覽此時的別集，很少人像桑悅那樣敬慕屈子，並選擇楚騷作為創作的題材。即使選擇模擬楚騷，也與屈作的思想內容有差異。如明初王禕〈招遊子辭序〉云：

予因反其意為辭以招之，庶幾其不驚於虛遠，而為吾聖人之歸。然宋玉、

40. 同註8，頁139。

41. 同註2，頁2。

景差大小〈招〉，務為譎怪之談，荒淫誇艷之語，今亦無取焉。(註42)

可見他對於二〈招〉綺麗的文筆、恣肆的內容有所不滿。永樂初，閣臣胡儼在〈叢菊賦〉中寫道：

章靈均之既餐兮，何自苦而沉湘？惟老圃之秋容兮，抱晚節而自芳。(註43)

對於屈子自沉，胡儼有所保留：他認為屈子既有高潔之志，窮困時便該獨善其身，不應有赴淵而死之舉。宣德間的周敘是明代較早為屈子、賈誼作吊詞的臺閣文臣。其〈吊屈三閭賈長沙詞序〉道：

嗟夫！自古有志之士，忠君愛國，不遇以死者多矣。未有若楚三閭大夫屈原、漢長沙太守賈誼之死之有深足悲者。原遭值懷王暗弱，固為可憾……余故謂為士者當法孔孟，為人君者當法堯舜而已矣。否焉，其不失中道耶！嘗誦屈賈文，悲其志，惜未達孔孟之道者。(註44)

以為屈子雖是忠臣志士，卻不善處窮，未達於中庸之道。孔孟為聖賢，思拯蒼生，不遇明主，也沒有怨天尤人，患得患失，而是著書立言，放眼於千秋萬世。這正是屈子、賈生所不及處。此論依然是沿襲著朱子的老觀點，純粹站在儒家的立場來評論屈子。至於桑悅對於屈騷的態度，卻與王禕、胡儼、周敘等臺閣文臣頗為不同；他明確提出「屬辭須宗屈宋班馬」的主張，以屈子為詞章之祖。成化十六年，桑悅尚在江西泰和任教諭，楚藩聘其前往武昌典鄉試。於是桑悅沿途採集芳草，又作〈吊屈原文〉。這無疑是桑悅曾通過創作來實踐自己的文學思想的例證。全文氣格高婉，有楚騷遺意。其序云：

長沙之汨羅去此頗遠，然公之魂於楚，無乎不在。(註45)

42. [明] 王禕，〈招遊子辭〉，《王忠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年初版），頁356。

43. [明] 胡儼，〈叢菊賦〉，《頤菴文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年初版），頁558。

44. [明] 周敘，〈吊屈三閭賈長沙詞序〉，《石溪周先生文集》（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影印萬曆二十三年（1595）刻本，1997年初版），頁588。

45. 見[明] 桑悅，〈吊屈原文〉，同註11，頁32。

正文復申言道：

餘此心之不朽兮，與元氣而頡頏。(註46)

可見桑悅清楚了解，屈子精神與文章對後世產生的影響。進而言之，他又把屈子比擬為儒家尊崇的伯夷、叔齊：

難先生之一死兮，配夷齊而有耿光。……予為先生之易兮，與巢許而同藏。(註47)

將屈子懷沙沉江與夷齊餓死首陽山相提並論，認為二者之高潔，無有差別。此外，他指出沉江是一個困難的決定，是屈子深思熟慮後的結果。像巢父、許由那樣獨善其身的做法，則相對容易得多。班固、顏之推、朱子以至明代前期臺閣諸臣，一直批評屈子不善處窮，忠而過、過於忠，失於中道。桑悅之言，可謂是一番有力的反駁。

前引〈唐詩分類精選後序〉之語，於《楚辭》亦頗有涉及。臺閣作家談及屈騷，一向限於輕描淡寫。桑悅主張詩以運意為宗，不可專論辭之平與不平，故特別推崇《楚辭》這富有深意的衰世之音，這在楚辭學沉寂的明代前期無疑是一番驚人之語。他十分看重《楚辭》的價值，嘗云：

〈風〉〈雅〉徽音絕，〈騷經〉何表表！(註48)

認為以詩亡之後，《楚辭》最得其遺意。正如前引〈唐詩分類後序〉所說：「大抵《三百篇》以後，取其詩之上薄風雅。」他又說：

《史記》馬遷憤，〈離騷〉正則悲。景仰無極篇，能知造化機。(註49)

《庸言》稱「詩根於太極」，能「感天地、動鬼神」。而這裡把屈子的文章譽為「無極篇」，可見《楚辭》符合桑悅「詩」的標準。此外，他將屈子與司馬遷並提，顯

46. 同註11，頁33。

47. 同註11，頁34。

48. [明]桑悅，〈調柳將辭郡和罷官夜飲山月軒分韻得主字韻·其三〉，同註11，頁142。

49. [明]桑悅，〈和齋居感興詩二十首·其五〉，同註11，頁144。

然本於〈太史公自序〉之言，相信發憤著書的理念。(註50)

桑悅對於《楚辭》的推崇，不僅源於理性的思考，更出自感性的喜好。他繼承了前人飲酒讀《騷》的傳統。如〈梅花五首·其四〉云：

一春清福想難消，日對梅花看《楚騷》。小佇有香聞永晝，澹粧無語伴清宵。因悲世俗思輕舉，獨蛻塵緣似太高。欲吊幽魂何處是？湘江雲冷路迢迢。(註51)

而〈至澧州〉則曰：

入夜吹山風滿座，當年照郢月臨窗。何時可化靈均怨，閒把〈騷經〉近酒缸。(註52)

不過，他在飲酒讀《騷》的同時，又「悲世俗」，欲「吊幽魂」，還希望以酒來化解靈均之怨，可見其心情並不平靜。他任職長沙通判，在楚地山川的環抱之中，卻依然感受到屈子的身後寂寞：

靈脩溺爭援，龍棹涉江始。云胡百代下，各載薜荔鬼？汨羅廟寂寂，血食半虛詭。流俗諭難明，高賢沒猶圯。(註53)

以屈子之高賢，其生前既不見信，死後祭祀又有何用？故曰「血食半虛詭」。更何況這祭祀也只是虛應故事，未必發自祭祀者的真情，故汨羅之廟平時也只寂寂無聲。任屈子如何賢明，卻與那些方命圯族同腐，豈非恨事？因此，他甚至痛惜地斥責屈子不智，不懂得與世推移：

異哉屈子不曉事，不能啜、糟與醢。入水見怨不見水，遂令沅湘日夜聲

50. 按：〈九章·惜誦〉云：「發憤以抒情。」（見〔漢〕王逸章句、〔宋〕洪興祖補註，《楚辭補註》（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重印修訂本），頁121。）〈太史公自序〉云：「昔西伯拘姜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臙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見〔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版），頁3300。

51. 〔明〕桑悅，〈梅花五首·其四〉，同註11，頁172。

52. 〔明〕桑悅，〈至澧州〉，同註11，頁174。

53. 〔明〕桑悅，〈調柳將辭郡和罷官夜飲山月軒分韻得主字韻·其八〉，同註11，頁142。

恨無窮期。(註54)

當然，如此責備的背後卻蘊藏著對屈子的無限同情。

實際上，桑悅喜好楚騷，主要是由於自己坎坷不平的仕途。如〈調柳將辭郡和罷官夜飲山月軒分韻得主字韻·其四〉吟詠賈誼曰：

薄宦亦長沙，喜見廟貌設。治世獨憂惶，迂疎踵遺轍。(註55)

而〈吊賈太傅文〉則寫道：

遭聖明而獨詘兮，胡今古之同科？謫人生之窮達兮，直寒暑之經過。(註56)

其後，桑悅從長沙調任柳州，又作詩云：

少年曾讀東坡論，自謂先生負漢家。今日飄零江海上，較文南詔過長沙。

(註57)

桑悅憐賈誼「治世獨憂惶」、「遭聖明而獨詘」，又謂此事「今古同科」，恐自己「迂疎踵遺轍」，甚至認為自己飄零廣西（南詔）的遭遇比賈誼更為坎坷，於是以古人之酒杯澆一己之壘塊。不過，桑悅雖也像同鄉祝允明、唐寅那樣屢次落第、傲誕不羈，卻並沒有囿於個人的悲愁而終生，或故作逍遙物外的態度，或以醇酒美婦來麻醉自己。他自我安慰說「謫人生之窮達兮，直寒暑之經過」，整體心態還是比較樂觀的。這再次證明，錢謙益稱桑悅為「可與進取者」，實乃知言。

#### 四、《楚辭評》的流傳、真偽與成書年代

##### (一)《楚辭評》的流傳

《楚辭評》向未付梓，故知者甚鮮，明清以來的書目皆無著錄。蔣之翹天啓

54. [明] 桑悅，〈醉時歌〉，同註11，頁156。

55. [明] 桑悅，〈調柳將辭郡和罷官夜飲山月軒分韻得主字韻·其四〉，同註11，頁142。

56. [明] 桑悅，〈吊賈太傅文〉，同註11，頁34。

57. [明] 桑悅，〈過賈太傅祠〉，同註11，頁182。



間編纂《七十二家評楚辭》，於〈自序〉中提及此書，而正文各篇的眉批和總評部分共收錄了桑評二十五條。由蔣序可知：所藏《楚辭評》既乃「未刻本」，若非稿本，亦為鈔本。加上此書係蔣氏家傳秘藏，其不顯於世，可想而知。明代中葉以後，出版了大量楚辭學集評的著作，一些早於《七十二家評楚辭》面世的著作皆不載桑評，<sup>(註 58)</sup>益可印證《楚辭評》之深藏若虛；換言之，《七十二家評楚辭》於天啓六年出版前，《楚辭評》的內容一直未有刊印。直至崇禎十年（1637），沈雲翔在蔣書的基礎上編印《八十四家評楚辭》。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聽雨齋刊本，知桑評二十五條悉逐錄自蔣書。清初周拱辰《離騷草木史》引用桑評一條，亦顯由蔣、沈之書過錄。此後三百年間，再無治騷者徵引桑評。據《嘉興府志·秀水文苑》記載，蔣之翹於明末避盜村居，收羅名人遺集數十種，選有《甲申前後集》。<sup>(註 59)</sup>可知蔣氏卒於清初。蓋《楚辭評》一書於蔣之翹去世後遂告亡佚。

復觀蔣之翹〈自序〉，所提及的尚有「李長吉未刻本」一種。楊鍾基〈李賀「楚辭評註」探佚辨證〉一文嘗論此書之真偽，其所據的本子有三種，皆藏於日本京都大學：

- 一、蔣之翹忠雅堂《七十二家評楚辭》；
- 二、日本享保九年（1724）尾平兵衛及文臺屋治郎兵衛所刊《楚辭》八卷、《後語》六卷、《辨證》二卷（收有八十四家系統之評語）；
- 三、沈雲翔聽雨齋《八十四家評楚辭》。

以李賀評語比勘之，三本所輯錄的內容頗有出入。故楊氏認為：「若蔣氏此一『家傳未刻本』秘不示人，則其後之沈雲翔等人自亦無從增補李賀評語。可見蔣之翹此一『家傳未刻本』曾於明清之際一度流傳。」<sup>(註 60)</sup>筆者並不同意這個推論。據楊氏所言，前引桑悅批駁柳宗元一條，唯見於沈雲翔《八十四家評楚辭》；<sup>(註 61)</sup>然筆者所見中科院本、上圖甲、乙本《七十二家評楚辭》皆有此語。則京都大學所藏蔣書與中科院、上圖藏本之內容已有出入。實際上，僅就上圖二本論之，兩者雖

58. 按：如陳深《屈子品節》、《批點本楚辭集評》，馮紹祖《觀妙齋楚辭集評》、張鳳翼《離騷合纂》、林兆珂《楚辭述註》、陳仁錫《屈子奇賞》、陸時雍《楚辭疏》、毛晉《屈子·楚辭集評》等皆然。

59. 見〔清〕吳仰賢纂、許瑤光修，《嘉興府志·秀水文苑》（臺北：成文出版社影印光緒五年（1879）刊本，1970年初版），頁1457。

60. 見楊鍾基，〈李賀「楚辭評註」探佚辨證〉，《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18卷（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87年）。

61. 同註60，頁238。

皆刊於天啓六年，但甲本所收的眉批便較乙本略多一二條。可知蔣之翹本人即對評語有所增補，不待沈雲翔方才爲之。且蔣之翹以後，大量引用李賀、桑悅評語者僅沈雲翔一家而已。若李、桑未刻本「曾於明清之際一度流傳」，引用者當不至如此鮮觀。且蔣氏於明清鼎革之際尚能收羅遺集、編印新書，其藏書當未散亡。以是觀之，沈雲翔於崇禎十年刊印《八十四家評楚辭》時，李賀、桑悅未刻本仍在蔣家。故此，沈書所錄李、桑二人之評語，蓋全來自蔣書；二人其他不見於蔣書的評語，其真偽是值得懷疑的。有見及此，本文所據一以蔣書爲準。

## (二)《楚辭評》的真偽

李賀、桑悅兩種未刻本之間，實有緊密的關係。蔣書卷三〈天問〉「焉有石林」章，桑悅眉批道：

李賀曰：「《海外紀》云：『石林在東海之東，有洞，深五百里。有鳥，多翠羽，入水化為虬。有獸，色白，九尾，善飛，亦能言。風多四面，一時則東西南北皆起焉。有石如木，挺立數仞，枝幹皆備，亦開花，朱色，爛然滿山，故名。』」(註62)

緊接此條之後，又有桑悅眉批云：

據李說甚合。宗元小生，以西極猩猩為對，誤矣。(註63)

此專就該章「何獸能言」而發。由是推之，若蔣之翹所言堪信，則李賀未刻本應先爲桑悅舊藏，其後方同桑書一併爲蔣家所有。然而，此二書的寫作、收藏、亡佚情況幾乎完全不見記載，故其真偽未免啓人疑竇。今人吳企明有〈李賀《楚辭評語》辨疑〉一文，斷定《七十二家評楚辭》中的李賀評語乃後人附會僞託。他認爲這些評論《楚辭》的文辭語多重出，議論低下。次者，這些評語乃是一種「批點式的詩歌評論」，然這種詩歌評論的形式在李賀生活的唐代尚未行世。而最重要的是：

62. 同註6，卷三，頁8a至8b。按：楊鍾基〈李賀「楚辭評註」探佚辨證〉以此條爲李賀評語，然據中科院本及上圖本，此條乃桑悅轉引李賀之語。

63. 同註6，卷三，頁8b。

考李賀卒於唐憲宗元和十一年（公元八一六年），而蔣之翹作序之年為明熹宗天啟六年（公元一六二六年），其間八百餘年，蔣氏之祖先從哪裡得到這個「李長吉未刻本」？長期以來，又如何嚴密保存，致使外人一無所知？這種未見之於前人著錄，又提供不出任何證據的「家傳」「未刻本」，突然於撰人死後八百餘年冒出來，是不會得到世人公認的。（註64）

吳氏所論雖未正面涉及桑悅《楚辭評》，但他對李賀評語的懷疑，可以幫助我們關於桑書的思考。天啟六年距離桑悅去世有一百二十餘年，雖遠不及李賀辭世之久，但為時亦不短。若把這番懷疑置於桑書之上，也甚是在理。針對吳企明的這個問題，楊鍾基作出了有力的駁斥，現歸納於下：

- 一、李賀評語不唯妙達屈子文心，亦正李賀學騷有得且與其本人之藝術風格互相契合者。且偉大之詩人未必皆為偉大之文學評論家，其人作詩雖或「務為挺拔」，而於作文之際亦非必然「多驚人句」。至謂評語之中「語多重出」，即使以真賞名家鍾嶸為例，其於品評不同人物之詩，亦有重複使用相同之詞語。
- 二、「批點式的詩歌評論」，如以近乎宋人詩話者為限，可推至《世說新語》及《顏氏家訓》。且唐代典籍至今散佚不存者，殆居泰半，而現存之李賀評語，僅屬諸家節引之斷簡零句。其本來面目如何，是否經已成書，其書形式若何，均已無從確認。
- 三、古代書籍文物於湮沉千年百載之後突然出現，並非鮮見。（註65）
- 四、蔣之翹〈自序〉確未對李、桑二書的版式及流傳經過作詳細交代。然此序乃《七十二家評楚辭》序，並非李、桑二書之序，固無必要在此詳述這些問題。設若蔣氏果有偽造之事，則其動機或是藉以標榜其家傳藏圖籍之豐富，並湊成七十二家之數。且擬偽造一書，必期有以取信於人。明代之前《楚辭》研究佚著之見於著錄者甚多，任取其二偽造數則，信非難事，何必捨易求難，

64. 吳企明，〈李賀《楚辭》評語辨疑〉，載《唐音質疑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初版），頁239至245。

65. 按：楊氏此處並無舉例，茲補充一例。晚明何喬遠之著作，於清代多有禁燬。至咸豐間，忽出現不見於明清書目的《釋騷》一卷，題為何喬遠著。今人崔富章《楚辭書目五種續編》著錄之。何喬遠為晚明時人，距楊淩幾三百年。楊淩何從鈔錄此書，不得而知。但與何喬遠同代的蘇茂相在〈萬曆集序〉中謂何氏早年寫詩取法乎《騷》，而《釋騷》之內容又頗多微言大義，不時關涉晚明黨爭，此固非區區楊淩所能偽造。

精研李賀詩篇，並取其中與楚騷互相發明之句冒之，並且牽連同樣未見於著錄之桑悅未刻本作爲陪襯？（註 66）

楊氏舉出四點——李賀之藝術風格、批點式評論的流行年代、古代書籍文物存亡的情況、蔣之翹作僞的可能，論證了《七十二家評楚辭》所載李賀評語的可靠性。尤其是第四點，本文亦克藉以證明，蔣之翹不可能僞造桑評。此外，桑悅的著作在其生前大都未有刊印，其身後亡佚甚多。故蔣之翹謂其所藏桑書乃未刻本，甚合於桑氏著作的實際情況。

取蔣書所錄的二十五條評語與桑悅其人、其文學思想比照，可發現一些相應之處。首先，蔣書所錄桑評的文學取向，與桑悅的主張非常符合。如前引袁鎮宇、劉明今所言，桑悅推舉祝允明、羅玘，是因爲他們的文章有奇氣。而《七十二家評楚辭》載桑悅論〈天問〉：

天問字法奇，句法奇，章法奇，亂而無序，正是大奇。（註 67）

又論〈招魂〉：

〈招魂〉體極奇，辭極麗，亦玉之卮格也。（註 68）

同樣是以「奇」爲準繩來論斷《楚辭》篇章的優劣。其次就其個性而言，如前引蔣書〈天問〉「何獸能言」之評，斥柳宗元爲「小生」，與桑悅好爲大言的矜誕性格甚爲契合。《藝苑卮言》謂桑悅調任柳州通判時，意不欲行。人問之，曰：「宗元小生擅此州名久，吾一旦往，掩奪其上，不安耳。」（註 69）可從旁證明桑悅對柳宗元的輕視。桑悅不喜柳宗元，蓋亦與其文學思想有關。柳宗元雖有〈天對〉，但對那些「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爲靈奇」的文章好感並不大。（註 70）蘇軾評柳文云：「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又論其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靖深不及也」。（註 71）可見柳氏詩文雖以簡古爲主，卻有

66. 同註 60。

67. 同註 6，卷三，頁 19b。

68. 同註 6，卷七，頁 10b。

69. 同註 16，卷一四九，頁 6a。

70. 〔唐〕柳宗元，〈與呂道州論非國語書〉，《柳河東全集》（北京：中國書店，1991 年初版），頁 336。

71. 〔宋〕胡仔，《漁隱叢話前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 年初版）卷十九，頁 1a 至 1b。

纖穠之氣，溫麗而不甚奇險。這與桑悅尚奇的思想有牴觸。復就其經歷而言，〈離騷〉「呂望之鼓刀兮」章，眉批曰：

世非乏呂、甯之流也，第恨文、桓無以遇耳。為之三嘆。(註72)

〈惜誦〉「迷不知寵之門」句，眉批曰：

「迷不知寵之門」，竟寫出一個桑判官。(註73)

因懷才不遇、屈居下僚而嗟嘆不已，這與桑悅的生平經歷正好呼應。由此可見，蔣書所錄為桑悅手筆之可能性頗高。

### (三)《楚辭評》的成書年代

《七十二家評楚辭》所錄二十五條桑評的真實性既無問題，為便知人論世，在討論《楚辭評》的內容前必須了解其寫作背景。桑悅出仕近三十年，歷任泰和訓導、長沙通判、柳州通判等職。其批〈惜誦〉時自稱為「桑判官」，知《楚辭評》之作必在就任長沙以後、辭官歸里以前。桑悅任長沙通判三年（1490-1493），因拙於催科而調柳州。他曾解釋催科無績的原因：

長沙地瘠民貧，欲嚴刑則損下，布欲〔欲布〕道則虧上。(註74)

介於官民夾縫之間，桑悅自不會勝任愉快。轉任柳州通判後，遭遇則大不相同。據楊循吉記載：

柳邊氓雜居，多竊發。先生出入賊巢穴，示以恩信，來附者萬家，鄉人至為繪像以祀，名聞會府。因得召至幕下用事，有賓師之隆、謀畫之柄。

(註75)

所言雖不無溢美，但可知桑悅在柳州時因事功頗受推崇，且得知府重用。因此，

72. 同註6，卷一，頁8b

73. 同註6，卷四，頁2b。

74. [明] 桑悅，〈庸言引〉，同註11，頁26。

75. [明] 楊循吉，〈明故思玄先生柳州府通判桑公墓誌銘〉，同註11，頁2-3。

桑悅自謂「迷不知寵之門」，當是其不甘逢迎長沙知府、向百姓嚴行催科的感嘆。抑有進者，長沙乃荆楚故地，楚騷遺風猶在。桑悅在長沙時，曾數次憑吊屈子、賈誼。其〈至澧州〉詩云「何時可化靈均怨，閒把騷經近酒缸」，可見他在公餘之際曾讀《楚辭》娛憂。因此，《楚辭評》殆桑悅以任長沙通判時的讀《騷》筆記為基礎，增補而成。

## 五、《楚辭評》內容考略

《楚辭評》的體例究為註釋、批點、筆記還是其他形式，已難具悉。然蔣之翹〈自序〉謂「參古今名家評」，為此書的內容提供了兩點訊息：

一、此書內容以「評」為主。(註 76)

二、蔣氏既言「參」，則於桑悅原書的內容必有取舍。(註 77)

觀《七十二家評楚辭》及《離騷草木史》所錄桑評，雖然文字數量有限，但對於《楚辭》的篇章卻覆蓋得比較全面，包括了〈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九辯〉、〈招魂〉、〈大招〉、〈惜誓〉、〈吊屈原賦〉、〈招隱士〉等作品。值得注意的是，賈誼〈吊屈原賦〉不見於王逸《楚辭章句》，乃朱子《楚辭集註》所增收。因此，桑書以朱註為底本，當無疑問。綜觀這二十五條桑評的內容，我們大致可以分為五類。第一類是關於《楚辭》文本的註釋。如〈天問〉「焉有石林」章，桑悅就轉引《海外紀》之語，並下論斷，以見舊註之非。此二條在本文第四節已有論及，茲不贅。其餘四類，現分目而述論之。

### (一)字、句、章法分析

朱子註《楚辭》，以賦比興之法〈離騷〉。但他對於《楚辭》字、句、章法的分析似也只限於此。故錢澄之指《集註》一書「逐句解釋，不為通篇貫串」。(註 78)

76. 按：「評」與「註」的差異，主要在方法與內容上。「註」一般不出對原文的訓字釋句，而典型的「評」則多為一些以感性筆調陳寫成的閱讀心得。這些文字未必有益於義理、考據，但在詞章上能將篇章的神理點撥出來，幫助讀者理解文本。觀附表二所列桑氏之說，正是如此。

77. 按：如楊鍾基所論，王逸《楚辭章句》及洪興祖《楚辭補註》皆皇皇鉅製，而《七十二家評楚辭》於王著僅引十四條，於洪書僅引廿六條。若王、洪二氏之書一旦散佚，欲就《七十二家評楚辭》重尋二書原貌，可謂十不得一。(同註 60，頁 250。)以此觀之，蔣書所錄桑悅的二十五條評語亦絕非原書的全部。

78. [明] 錢澄之，《莊屈合詁》(合肥：黃山書社，1998 年初版)，頁 139。

而桑悅對於〈天問〉、〈吊屈原〉、〈招隱〉諸篇的的字、句、章法則有比較詳細的討論。〈天問〉一篇，古人向稱難解：「一部《楚辭》，最難解者，莫如〈天問〉一篇。以其重複倒置，且所引用典實，多荒遠無稽。」<sup>(註79)</sup>而桑悅謂：

天問字法奇，句法奇，章法奇，亂而無序，正是大奇。若以事之怪僻為奇。又失之其所為奇矣。<sup>(註80)</sup>

又評「遂古之初」句：

開口便覺大奇，只遂古二字，不知道遺下許多開端。<sup>(註81)</sup>

復評「馮珖利決」句：

四字精鍊之極。<sup>(註82)</sup>

認為〈天問〉一篇的特點，全在於一個「奇」字上。但是，其「奇」並不在於典故的怪僻，而是章法的「亂而無序」。後世註家如黃文煥就繼承了桑悅的看法：

吾以不解解之，即為善讀之法焉。<sup>(註83)</sup>

周拱辰也論述道：

〈天問〉有可解者，有可解不可解者，有不必要可解者。或書佚無考，或字訛不真，若憑臆解之，反為本文害。<sup>(註84)</sup>

這種態度比強分段落更具有存真的精神。

至於賈誼〈吊屈原賦〉和淮南小山的〈招隱士〉，桑悅則作出了比較：

79. [清] 林雲銘，《楚辭燈》（康熙三十四年（1695）杭州挹奎樓刊本）卷二，頁45a。

80. 同註6，卷三，頁19b。

81. 同註6，卷三，頁1b。

82. 同註6，卷三，10a。

83. [明] 黃文煥，《楚辭聽直·合論》（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據崇禎十六年（1643）初刻、順治十四年（1657）續刻本影印，1997年初版），頁592。

84. [明] 周拱辰，《離騷草木史·離騷拾細》（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清嘉慶八年（1803）聖雨齋刻本），附錄頁7a。

兩漢無騷，獨賴有此。即〈招隱〉奇峭，殊乏和緩之度，信莫及也。(註85)

復謂：

〈招隱〉筆力適上，骨奇法古，於西京中矯矯者，非後來擬作家可及。(註86)

〈吊屈原賦〉情深而氣婉，頗得楚騷餘韻；〈招隱士〉則奇瑰聲牙，視屈宋已有不同。因此桑悅認為，只有〈吊屈原賦〉才保存了楚騷和緩的風格。而〈招隱士〉雖有異於楚騷，卻能自創一格，也非東方朔、嚴忌、王褒等人之遽躡舊跡所能彷彿。綜而觀之，桑悅以兩漢辭賦中，繼往者惟〈吊屈原賦〉，開來者亦止〈招隱士〉而已。

## (二)文體探究

《楚辭》諸篇中，以〈卜居〉、〈漁父〉兩篇的文體最不類其他。朱子云：

〈卜居〉〈漁父〉文字便無些小窒礙，想只是信口恁地說，皆自成文。(註87)

這一點桑悅是贊同的，遂於評語中引用之。(註88)但是，朱子雖懷疑兩篇為「原之設詞」，仍將之視為實事；(註89)至桑悅則敲定其皆為「偽立客主，假相酬答」之辭。對於兩篇之間的差別，桑氏也有所發明：

〈漁父〉與〈卜居〉雖皆為偽立客主，假相酬答之詞，然其體格較〈卜居〉又變矣。〈卜居〉句末用「乎」字，「乎」字上必協韻成文。〈漁父〉則逐段摹寫，有《國策》氣，此乃傳記體也。賦家安得誤認之而效其法乎！須辨。(註90)

桑悅指出：〈卜居〉句末用「乎」字，「乎」字上必協韻成文。這種形式無疑脫胎自〈離騷〉。然而，〈卜居〉的正文以屈子的獨白為主，鄭詹尹只是一個配角。而

85. 同註6，卷八，頁6a。

86. 同註6，卷八，頁15b。

87.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長沙：岳麓書社，1997年初版），頁2976。

88. 見同註6，卷五，頁10b引。

89. [宋]朱子，《楚辭集註》（臺北：文津出版社，1987年版），頁218。

90. 同註6，卷五，頁12a。



〈漁父〉中，屈子與漁父一問一答，有來有往（即所謂「逐段摹寫」），二人在此文中幾乎佔了對等的地位。這種型態更接近《戰國策》中的論辯，與傳記史書相類，去騷賦則遠矣。因此桑悅斷言，賦家設詞應以〈卜居〉、而非〈漁父〉為法，所言甚為獨到。

從桑悅對〈卜居〉〈漁父〉的論述，可知他十分注重文體的正變。他又評論〈招魂〉篇道：

〈招魂〉體極奇，辭極麗，亦玉之勑格也。昔人云天不生屈原，不見〈離騷〉。予云天不生宋玉，不見〈招魂〉。（註91）

雖區區數言，卻推舉備至。桑悅是否曾詳言〈招魂〉的勑格何如，現已難知。然今觀〈招魂〉一篇，始設以帝巫對話，繼以招辭，終以亂辭，實下開後世大賦之體。故桑悅稱之為勑格，庶幾無愧。不過前文已言，桑悅論詩以運意為宗，因此他贊許〈招魂〉，除其有文體的開拓之功外，蓋亦稱賞宋玉眷慕其師之心。從桑悅對〈九辨〉〈九歌〉的評價，益可肯定：

宋玉不如屈原，以〈九辨〉與〈九歌〉較之，遂不啻天淵矣。（註92）

如何比較〈九辨〉〈九歌〉，桑悅並沒有說明。〈九辨〉的文理較屈作更為分明，句式更為靈活，若僅從文體來看，當居〈九歌〉之上。然而，桑悅這次並沒有稱〈九辨〉為「勑格」，更斥宋玉視屈子「不啻天淵」，究其原因只可能是：〈九辨〉全文的主旨，不外乎文人失意、自傷自憐之意，並無屈子那種憂國憂民的高尚情操。因此在桑悅看來，其格調遂不及屈子〈九歌〉以人神的際合來寄託忠君愛國之心了。由此可知，桑悅始終將運意置於首要之處。

### （三）作者考辨

早在朱子《集註》中，就開始考辨《楚辭》篇章的作者。如〈大招〉一篇，朱子認為是景差的作品，其理據為：

91. 同註6，卷七，頁10b。

92. 同註6，卷六，頁11a。

〈大招〉不知何人所作，……今以宋玉〈大、小言賦〉考之，則凡差語，皆平淡醇古，意亦深靖閒退，不為詞人墨客浮夸艷逸之態，然後乃知此篇決為差所作無疑也。（註93）

實際上，宋玉〈大言賦〉、〈小言賦〉中景差言語的篇幅非常小，加上不能排除宋玉抑人揚己之嫌，故朱子之推論似過於武斷。無論如何，《楚辭》的考辨工作畢竟在朱子手中展開了。

明代前期，學者對《楚辭》評論甚少，考辨工作也鮮有繼續。相比之下，二十五條桑評卻也涉及《楚辭》篇章的作者問題。如〈惜誓〉一篇，桑悅就否定其為賈誼所作：

〈惜誓〉不知誰作，洪朱二家信以為賈誼，非也。誼死時僅年三十有三，何以此章起句遂曰「惜年老而日衰兮，歲忽忽而不反」？（註94）

《史記》、《漢書》賈誼傳只載〈吊屈原賦〉及〈鵬鳥賦〉兩篇，而王逸謂〈惜誓〉的作者「或曰賈誼，而疑不能明」。（註95）桑悅則試從文本中尋找內證，論述方式比朱子更具說服力。

不過，對於二〈招〉的作者，桑悅也有新的見解：

〈大招〉體制不出〈招魂〉，而摘辭命意又與〈招隱〉相似，或者淮南八公之徒因宋玉已有〈招魂〉，復擬作〈大招〉〈小招〉，未可知也。況其詞賦原以類從，或稱大山，或稱小山者乎！不然何所據而以玉之〈招魂〉加其名曰小也？〈小招〉疑別有一篇，恐逸不傳。（註96）

他通過對〈大招〉與〈招隱士〉氣格的比較，來推斷前者為漢人的擬作。這與朱子論〈大招〉作者的方式非常接近。但桑悅以淮南王劉安的幕僚中有大山、小山，來猜度〈大招〉〈小招〉之並存，可謂比屬不類；繼而云〈小招〉「別有一篇，恐逸不傳」，更是臆測之辭。不過，桑悅蓋欲打破當時沉寂已久的學術悶局，以改變

93. 同註2，頁145。

94. 同註6，卷八，頁1a。

95. 〔漢〕王逸章句、〔宋〕洪興祖補註，《楚辭補註》，頁227。

96. 同註6，卷七，頁17b。

舊說陳陳相因之勢，於是標新立異，其想法是不難理解的。

#### (四) 感悟式批評

除了上述的幾種評論方式外，桑悅的《楚辭》評語常有感悟式批評。僅據《七十二家評楚辭》的內容，不可能知道這些評語在《楚辭評》中處於怎樣的位置，但這些評語的內容確與晚明的評點文字無甚區別。孫琴安認為，評點文學重直覺和主觀感受，短小精悍，生動活潑，帶有較多的鑑賞性，且多停留在感性認識的階段。<sup>(註 97)</sup>譚帆則舉小說評點為例道，批評對象內涵豐贍且以表現自身情感為主的小說評點在形態上形式完備、論辯色彩濃烈；而旨在推動小說商業傳播的評點則在形態上以簡約的形式和感悟式的行文方式為主。<sup>(註 98)</sup>就桑悅的《楚辭》評語而言，其中的確有不少條是以「表現自身情感為主」，而又「在形態上以簡約的形式和感悟式的行文方式為主」——不同的是，桑悅評《楚辭》並非為推動其作品的商業傳播。這些文字未必富於學術價值，在文學欣賞中卻能賦予讀者以情趣和興致。如他評〈離騷〉道：

〈騷經〉一篇，令人讀之撫劍，於數千載下猶若欵歎不盡者，可見屈子孤忠，感人最深。<sup>(註 99)</sup>

論〈山鬼〉則云：

讀「山中人」一段，如入深徑無人覺，古木枯藤，皆有異致。<sup>(註 100)</sup>

〈哀郢〉「望長楸而太息」章，眉批曰：

語最淡，情最深。<sup>(註 101)</sup>

而〈悲回風〉「驟諫君之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兩句，眉批則曰：

97. 孫琴安，《中國評點學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年初版），頁9-10。

98. 譚帆，《中國小說評點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初版），頁68。

99. 同註6，卷一，頁23a。

100. [明]周拱辰，《離騷草木史》（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清嘉慶八年（1803）聖雨齋刻本）卷二，頁21a。

101. 同註6，卷四，頁8a。

字字是血，字字是淚，讀之不盡隱痛。(註102)

這些評語本身就具備一定的審美情趣。讀者若持之與正文合看，原文的感染力或許會進一步增強。

桑悅這些感悟式的評語，往往也有借題發揮之處。如前文第四節所論，他評〈離騷〉「呂望之鼓刀兮」章：「世非乏呂、甯流，弟恨文、桓無從遇爾。爲之一嘆。」評〈惜誦〉篇：「『迷不知寵之門』句，竟寫出一個桑判官。」這些評語與其說是用以幫助讀者理解《楚辭》，毋寧說是爲了抒發桑悅仕途坎坷、懷才不遇的抑鬱之情。

孫琴安將明代弘治以後稱爲中國評點文學的全盛期。對於弘治以前評點之風很弱的原因，他認爲有兩端：第一，臺閣派主導文壇，文學氣氛不活躍，文學流派甚少產生，人們也就很少想到以評點的方式來宣揚自己的文學主張。第二，評點的產生與授課有關，在關鍵處旁批幾句，或文章末尾評析一番，都是爲了讓讀者掌握和理解寫詩作文的方法，無關文壇論爭。由於明代前期獨尊朱學，講學風氣不盛，故評點並不流行。(註103)而桑悅作《楚辭評》正在弘治初年，略早於陽明心學興起之時。這些感悟式批評的文字，數量雖少，不可不謂得評點風氣之先。

## 六、結語

晚明蔣之翹在《七十二家評楚辭·自序》中稱家藏有「桑民懌未刻本」，全書正文部分的眉批和總評在桑悅名下者共有二十五條。若蔣氏所言不虛，則桑悅《楚辭評》實係明代前期唯一的楚辭學新著，也是明人第一部楚辭學專書。通過對《楚辭評》的探析，深入了解桑悅的文學思想，審視成化、弘治間臺閣文風衰熄、道學僵化的實況，可謂饒有意義。然據蔣氏所言，《楚辭評》向乃未刻本，家藏不以示人，故其存其亡，世莫聞知。兼以清代以後，《七十二家評楚辭》不爲學者所重，(註104)故亦無人根據蔣書檢核桑悅遺說。有見及此，本文嘗試考辨桑悅之生平及著

102. 同註6，卷四，頁26b。

103. 同註97，頁87-88。

104. 如楊鍾基言其「所列家數雖多，然於每家均載其零章斷句，徒炫繁博，其實空疏，於《楚辭》研究者中早有定評」。同註60，頁250。

作，綜論其文學思想之大要，探討《楚辭評》之流傳、真偽、成書年代，最後以《七十二家評楚辭》所錄桑悅二十五條評語考述《楚辭評》原書之內容特色。

明代前期一百四十年間，皇權膨脹，道學獨尊，導致學術風氣的沉寂。文壇上，詩尊王孟、文尚歐曾的臺閣文風盛行，其作品內容主要以吟詠盛世、歌頌君恩為主。就楚騷而言，由於屈子的行徑不符合儒家中庸的準則，臺閣作家多罕言之，以至這個時期的楚辭研究者甚為寥落。而被現代學者視為師古說先驅者的桑悅，屢試不第、屈居下僚，又秉性狂簡，故為文、論文與臺閣作家大不相類。他繼承了宋濂的文道合一論，不把文視為道的附庸，又標榜「奇古」的詩文，指責臺閣作家模擬唐詩時獨沾「柔熟」一味，提出詩以運意為宗，這些主張在當時可謂擊中了臺閣文風的要害，因此如丘濬、李東陽等臺閣作家也頗為賞識桑悅的才華。《思玄集》中，每每語涉屈騷。這些論述反映出桑悅仕途不順時援騷自解的心情，更構成其師古說的重要內容。

假如要進一步論析桑悅的文學思想，《楚辭評》一書不容忽視。本文在展開對《楚辭評》的論述前，先以《七十二家評楚辭》所錄二十五條評語的內容與桑悅比照，從個性、經歷、文學取向三端尋找契合點，證明這些評語並非偽造。為收知人論世之效，復考定《楚辭評》的成書年代當在弘治三年至六年時——即桑悅任長沙通判期間。

總觀二十五條桑評，所涉及的內容可歸納為五點：《楚辭》文本註釋，字、句、章法分析，文體研究，作者考辨，感悟式批評。明代後期的楚辭學著作對於這些範疇固皆有涉及，然在恪守朱註的明代前期卻並非如此。如內容註釋方面，桑悅引《海外紀》以解釋〈天問〉「焉有石林」一章的內容，表達與朱註不同的意見。永樂以降，以楊士奇為代表的臺閣作家偶然談及屈騷，往往只是著重屈子之忠，讚美芳草之潔，有以偏概全之嫌。而《楚辭評》的感悟式批評，雖然也含有「以古人註我」的成分，但卻能切合屈子的狂狷心態，有助讀者對《楚辭》文本的感性拿捏，且得明代評點風氣之先，與晚明竟陵派師心說者的詩歌批評方法遙相呼應。弘治季年，前後七子提倡「文必秦漢、詩必盛唐」，注意揣摩古代文學作品的內容和形式；楊慎以後，考據之學日益興盛。而《楚辭評》在文體研究、作者考辨方面，就〈卜居〉〈漁父〉的體式、〈惜誓〉〈大招〉的著作權等問題提出了個人的看法。總體來看，桑悅不少的論點仍欠深入、有臆斷之嫌，尚待進一步的討

論，但畢竟為當時沉寂的學術界注入了新血，體現出明代中葉學風轉變時期的楚辭學特色。因此，儘管《楚辭評》從未付梓、亡佚已久，不為學者所知，但仍應在明代楚辭學史、以至文學史上佔有一席之地。

附表一：桑悅著述一覽

書 名	付梓否	存亡	附 記
1.《周易義釋》	否	亡	朱彝尊《經義考》錄有遺說四條。
2.《春秋義釋》	否	亡	
3.《周禮義釋》	否	亡	
4.《太倉州志》十一卷	是	存	有弘治十三年刊本、宣統元年重刊本、《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續編》影印宣統本。
5.《庸言》一卷	是	存	或題作《桑子庸言》、《思玄庸言》。有《思玄集》、《百陵學山》及《學海類編》等本。
6.《楚辭評》	否	亡	其遺說見於蔣之翹《七十二家評楚辭》。
7.文集十卷	否	亡	所載篇章蓋皆見於《思玄集》，然原貌已不可知。
8.《思玄集》十六卷	是	存	有計宗道弘治十八年本、桑大協萬曆二年活字刊本、萬曆四十四年翁憲祥刻本、雍正四年謝浦泰鈔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據桑大協本影印本。

附表二：《七十二家評楚辭》所錄《楚辭評》之說

	正文章／句	桑 評
卷一〈離騷經〉	扈江離與辟芷兮	語極香豔。(1:3b)
	呂望之鼓刀兮	世非乏呂、甯之流也，第恨文、桓無以遇耳。爲之三嘆。(1:18b)
	(總評)	〈騷經〉一篇，令人讀之撫劍，於數千載下猶若欬歔不盡者。可見屈子孤忠，感人最深。(1:13a)
卷二〈山鬼〉	山中人兮芳杜若	讀「山中人」一段，如入深徑無人覺，古木枯藤，皆有異致。(2:13a)（按：亦見《離騷草木史》2:21a。）
卷三〈天問〉	曰：遂古之初	開口便覺大奇。「遂古」二字，不知管下許多開端。(3:1b)
	焉有石林	李賀曰：「《海外紀》云：『石林在東海之東，有洞，深五百里。有鳥，多翠羽，入水化爲虬。有獸，色白，九尾，善飛，亦能言。風多四面，一時則東西南北皆起焉。有石如木，挺立數仞，枝幹皆備，亦開花，朱色，爛然滿山，故名。』」(3:8a-8b)
	(同上)	據李說甚合。宗元小生，以西極猩猩爲對，誤矣。(3:8b)
	馮珧利決	「馮珧利決」四字精鍊之極。(3:10a)
	何馮弓挾矢	語及興亡，自不覺其言之激而痛也。想其當日光景，必怒髮直上指冠。(3:17a)

	(總評)	〈天問〉字法奇，句法奇，章法奇，亂而無序，正是大奇。若以事之怪僻爲奇，又失所爲奇矣。(3:19b)
卷四 〈惜誦〉	迷不知寵之門	「迷不知寵之門」，竟寫出一個桑判官。(4:2b)
卷四 〈哀郢〉	望長楸而太息兮	語最淡而情最深。(4:8a)
卷四 〈懷沙〉	玄文處幽兮	可恨真可恨。(4:14a)
	同糅玉石兮	字字是血，字字是淚。讀之不盡隱痛。(4:16b)
卷五 〈遠遊〉	(總評)	樂府有〈遠遊〉篇云：「九州不足步，願待凌雲翔。」詞雖閒麗，但可作此章傳注。(5:8a)
卷五 〈卜居〉	(總評)	考亭曰：「〈卜居〉文字便無些小窒礙，想只是信口恁地說，皆自成文。」(5:10b)
卷五 〈漁父〉	(總評)	〈漁父〉與〈卜居〉雖皆僞立客主、假相酬答詞，然其體格較〈卜居〉又變矣。〈卜居〉句末用「乎」字，「乎」字上必叶韻成文，〈漁父〉則逐段摹寫，有《國策》風。此乃傳記體也。賦家安得誤認之而效而法乎？須辨。(5:12b)
卷六 〈九辯〉	(總評)	宋玉不如屈原，以〈九辯〉與〈九歌〉〈九章〉較之，遂不啻天淵矣。(6:11a)
卷七 〈招魂〉	砥石翠翹	爛若披錦，無處不善。(7:5b)



	(總評)	〈招魂〉體極奇，詞極麗，亦玉之刳格也。昔人云：「天不生屈原，不見〈離騷〉。」予云：天不生宋玉，不見〈招魂〉。(7:10b)
卷七 〈大招〉	(總評)	〈大招〉體製不出〈招魂〉，而摘辭命意，與〈招魂〉相似。或者淮南八公之徒因宋玉已有〈招魂〉，復擬作〈大招〉〈小招〉，未可知也。況其詞賦，原以類從。或稱大山、或稱小山者乎！不然，何所據而以玉之〈招魂〉加其名曰小也？〈小招〉疑別有一篇，恐逸不傳。(7:17b)
卷八 〈惜誓〉	(總評)	〈惜誓〉不知誰作，洪朱二家信以爲賈誼，非也。誼死時僅年三十有三，何以此章起句遂曰「惜年老而日衰兮，歲忽忽而不及」？(8:4a)
卷八 〈吊屈原〉	(總評)	兩漢無《騷》，獨賴有此。即〈招隱〉奇峭，殊乏和緩之度，信莫及也。(8:6a)

## 主要參考書目

### 傳統文獻

-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版。
- 〔漢〕王逸，《楚辭章句》，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明馮紹祖萬曆丙戌刊本，1974 年再版。
- 〔漢〕王逸章句、〔宋〕洪興祖補註，《楚辭補註》，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重印修訂本。
- 〔唐〕柳宗元，《柳河東全集》，北京：中國書店，1991 年初版。
- 〔宋〕胡仔，《漁隱叢話前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 年初版。
- 〔宋〕朱子，《楚辭集註》，臺北：文津出版社，1987 年版。
-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長沙：岳麓書社，1997 年初版。
- 〔明〕宋濂，《文憲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 年初版。
- 〔明〕王禕，《王忠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 年初版。
- 〔明〕胡儼，《頤菴文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 年初版。
- 〔明〕何喬新，《椒邱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 年初版。
- 〔明〕李東陽，《懷麓堂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 年初版。
- 〔明〕吳寬，《家藏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 年初版。
- 〔明〕桑悅，《思玄集》，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影印萬曆二年（1674）桑大協活字刊本，1997 年初版。
- 〔明〕廖道南，《殿閣詞林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 年初版。
- 〔明〕王世貞，《藝苑卮言》，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 年初版。
- 〔明〕胡應麟，《詩藪·續編》，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影印明刻本，1997 年初版。
- 〔明〕焦竑，《國朝獻徵錄》，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據明刊本影印，1997 年初版。
- 〔明〕蔣之翹，《七十二家評楚辭》，北京：中國科學院藏忠雅堂天啓六年（1626）刊本。
- 又一函，上海：上海圖書館藏忠雅堂天啓六年（1626）刊本。
- 〔明〕王夫之，《明詩評選》，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7 年初版。
- 〔明〕錢澄之，《莊屈合詁》，合肥：黃山書社，1998 年初版。
- 〔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北京：中華書局，1961 年初版。
- 〔清〕朱彝尊，《明詩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 年初版。
- 〔明〕黃文煥，《楚辭聽直·合論》，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據崇禎十六年（1643）初刻、順治十四年（1657）續刻本影印，1997 年初版。
- 〔明〕周拱辰，《離騷草木史·離騷拾細》，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清嘉慶八年（1803）聖雨齋刻本。
- 〔明〕黃宗羲，《明文海》，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 年初版。
- 〔清〕林雲銘，《楚辭燈》，康熙三十四年（1695）杭州挹奎樓刊本。
- 〔清〕張廷玉主編，《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版。
- 〔清〕永瑤主編，《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影印初版。
- 〔清〕王錦修、吳光昇纂，《柳州府志》，海口：海南出版社影印乾隆二十五年（1750）刊本，2000 年初版。
- 〔清〕吳仰賢纂、許瑤光修，《嘉興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影印光緒五年（1879）刊本，1970 年初版。
- 陳田，《明詩紀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初版。

## 今人著述

- 易重廉，《中國楚辭學史》，長沙：湖南出版社，1991年初版。
- 姜亮夫編，《楚辭書目五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新一版。
- 孫琴安，《中國評點學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年初版。
- 袁震宇、劉明今，《明代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初版。
- 張健，《明清文學批評》，臺北：國家出版社，1983年初版。
- 許總，《宋明理學與中國文學》，南昌：百花洲出版社，1999年初版。
-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9年初版。
- 陳大康，《明代商賈與世風》，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年初版。
- 陳書錄，《明代詩文的演變》，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年初版。
- 陳國球，《唐詩的傳承：明代復古詩論研究》，臺北：學生書局，1990年初版。
- 黃卓越，《明永樂至嘉靖初詩文觀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初版。
- 廖可斌，《明代文學復古運動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初版。
- 臺灣中央圖書館編，《明人傳記資料索引》，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8年再版。
- 鄭利華，《明代中期文學演進與城市形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5年初版。
- 簡錦松，《明代文學批評研究》，臺北：學生書局，1989年初版。
- 吳企明，〈李賀《楚辭》評語辨疑〉，載《唐音質疑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初版。
- 孫學堂，〈明弘治、正德時期吳中文學思想的新變〉，《華僑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年04期，泉州：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編輯部，2001年。
- 張浩遜，〈明代常熟詩文述論〉，《常熟理工學院學報》2005年03期，常熟：常熟理工學院學報編輯部，2005年。
- 楊鍾基，〈李賀「楚辭評註」探佚辨證〉，《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18卷，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87年。

## A Study of Sang Yue and His *Chu Ci Ping*

Nicholas L. Chan

Fo Gua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 ABSTRACT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when the imperial autocracy was expanding and Neo-Confucianism was orthodox, the study of *Chu Ci* was in a low key. Sang Yue 桑悅 (1447-1503), a forerunner of classicism, composed *Chu Ci Ping* 楚辭評, the first work about the study of *Chu Ci* in the Ming dynasty. This book was never published and is no longer extant, with only 25 entries of its fragments kept in *Qi Shi Er Jia Ping Chu Ci* 七十二家評楚辭, edited and published by Jiang Zhi-qiao 蔣之翹 in the late Ming period.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Sang Yue's life and his works and a general depiction of his literary ideas,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25 entries of *Chu Ci Ping*'s fragments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questions about the circulation, the authenticity, and the composition background of this book. In addi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25 entries of the fragments, the original content of *Chu Ci Ping* is studied so as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literary thoughts of Sang Yue, the features of the study of *Chu Ci* and the literary vogue, and the circumstances of a changing academic climate in the mid-Ming times.

**Key words:** Sang Yue, *Chu Ci Ping*, *Qi Shi Er Jia Ping Chu Ci*, *Chu Ci*, Literature in the Ming Dynasty

(收稿日期：2006.3.1；修正稿日期：2006.3.27；通過刊登日期：2006.5.5)